

宋「夫」主編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旅



中华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中华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军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旅/宋一夫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8 (2009. 6 重印)

ISBN 978-7-80528-064-6

I. 军... II. 宋... III. 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355 号

Junlǚ

军旅

主 编 宋一夫

责任编辑 孙洪军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印 张 4

书 号 ISBN 978-7-80528-064-6

定 价 20. 00 元

子规啼血唤东风（代序）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化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蒂是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底蕴的枯涸与丰润。

中国古代的进步与中国近代的落后，致使清醒的仁人志士从五四时期起，就以其沸腾的热血和竭力地呐喊，要求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构筑，从那时起，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了。

即将呈现给您的《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就是我们全体编著人员，为重构中国文化而进行的潜心尝试。

面对案端一叠叠隽永的书稿，一幅幅精美的图画，集编辑和作者于一身的我们，激动之情难以平抑。同时，另一种思虑也油然而生。据新闻出版署统计，1992年我国出版图书八万种以上，而1993年则达九万种。按图书品种来说，我们早已进入图书出版大国的行列，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分析，我国又是新版图书最没有信息量

的几个国家之一。大量图书选题陈旧、内容重复已成为当前图书出版事业的一大痼疾。那么，我们推出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是文化的精品，还是在制造精神垃圾呢？

扪心自问，出版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从主观上，著述者绝不仅仅为了一千字、一幅画几十元的稿费，出版者也绝非想的只是经济效益，想从读者腰包中掏出百八十元钱，而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其文化典籍之多，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可就现今中国来说，尚存在着大面积的文化沙漠地带。据有关普查资料，12岁以上人口中，有2.35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就是说在我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资料，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人数为8.24亿，而我国竟占了近三分之一。文盲意味着愚昧、无知、落后与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不使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而去企盼经济的腾飞，只能是善良人的美好愿望。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个无知的、对本国文化毫不了解的人，不管他是大腕，还是大款，说他是中国人，但他决不是鲁迅所讲的“民族脊梁”的中国人。这种中国人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而肩负起历史与现实使命

的人。

尤其是我国改革已进入十分关键阶段，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它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繁荣，但也会使已习惯于计划经济生活的我们，心态发生强烈的震撼。新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像钟摆一样失衡于人们中间，引起人们种种的彷徨与困惑。当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从历史当中找到了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与我们毗邻的日本和韩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逐步平稳发展到现代化社会。而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文化，是大量地吸收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中国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立足点无非是过去的中国和现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人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承传。同中国和中国人相伴而生结伴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不断地更新，是一个不断分析扬弃和综合利用的无限进程。也正是这样一个无限进程，才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息，使中华民族最终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获得比现在更为殊荣的地位！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撰写和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到流变，进行有重点、有区别地纵横向梳理。我们所说的文化精华

既指作为某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核或精髓，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同时也指作为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或行为规范；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应该承传发扬的。我们在撰写与编辑过程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精华性，又确保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以及采用故事和图画以达到文化的普及性。既要体现精华，又要考虑不使文化体系支离破碎，既要照顾到“阳春白雪”，又要想到“下里巴人”。这些，均颇费我们的心血。

当然，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其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实践价值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或许使有的人感到传统文化是一种过时的束缚，但是，当我们赞叹现代意识进步时，又有哪一株当代文明的参天大树不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沃土之中呢？我们不去僵化地恪守传统文化，而要用渊远流长、营养丰富的文化精华，去激发中华民族昂扬崛起的生命冲动……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相信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能在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重构中成为一种催化剂。如此，我们也就无愧于国人，不负自己。

是为序。

“军旅”学说的解析

“军旅”在古代有两个含义：一指军队，《国语·齐语》说：“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二指军事，战争，《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有战争则必有军队，有军队就有一个对将帅军卒的管理问题，即古人所说的“振旅”、“治兵”之意。因而军旅与治军紧密相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治军的内容十分宽泛，向来为兵家所重视，或明以号令，或施以赏罚，或御之以术，或亲之以情，或千方百计鼓舞士气，或不择手段驱兵死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相传为西周时太公吕尚撰，实乃后人伪托之作）中的《龙韬》论及治军问题的有许多篇，书中提出了令行禁止、诛大赏小的治军方

法。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将威》篇）书中还提出了将帅身先士卒、体恤下情的治军方法。太公说：“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慎，而见劳苦之明也。”（《励军》篇）

《孙子兵法》中论述军旅之事的语句，所在多有。他首先提出了主将应具备的品格：“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他根据君主、将帅、士卒的素质及其执法、练兵、赏罚等情况，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他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孙武提出了军队的编制问题，编制合理，则

在治军上有了组织保证。孙子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分数指部曲和什伍，形名指旌旗和金鼓。军队组织得好，并规定了指挥信号，指挥大部队同指挥小部队一样，都能步调一致，听从指挥了。他把统一全军的步调看得十分重要，在《军争篇》中说：“夫鼓金旌旗者，所以一（统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提出了恩威并济的治军原则，即既用怀柔、安抚手段，又用严厉的惩罚手段，从而使军队养成服从的习惯，训练出一支必胜之军，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这里强调治军不只体现于战时，更重要的是在平时，平时就要用严格贯彻军令的要求来管教士卒。孙武要求主将领导得法，方能使士卒一致奋勇作战，像一个人一样，为此，他说：“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孙子又说：“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九地篇》）孙武对将帅的品格、处事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对主帅的责任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

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篇》）这里自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一贯宣扬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体现。但从保守军事秘密这一点来说，依然含有合理的部分。

管子关于军旅的建设，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而又行之有效的军事组织，从最基层的由五人组成的“伍”，到由一万人组成的“军”，组织严密，井然有序。管子的建军思想是把士卒同它的居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士卒彼此熟悉，十分便于管理。他说：“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在平时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小匡篇》）管子治兵，管理军旅，还特别重视对士卒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兵法篇》云：“五教者，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

吴起在《吴子兵法》特设《治兵》篇，用来全面阐

述他的军旅说。首先，吴起认为“二重一信”是用兵之道的首要问题，他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其次，吴起主张“以治为胜”，认为取胜并不在兵多，他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再次，吴起提出了行军时的管理办法：“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也。”又次，吴起主张“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吴起兵法》中还设《论将》一篇，提出了对主将素质、品格的要求：“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

进入战国中期，客观形势有了发展，作战方法亦随之有了变化。孙臆对军旅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发展。他说：“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

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他认为“兵之急者”是“料敌计险”，“必攻不守”。（《威王问》）孙臆又说：“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篡卒》篇）孙臆认为取胜的关键在选用强卒，士卒作战勇敢在于军法严明，军队战斗力强在于将帅言而有信，军队具有好的素质在于将帅明白用兵的道理。孙臆说：“若知兵之情，弩失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篇）孙臆用矢、弩、发者（发射的人）分别比喻士卒、将帅、君主，认为只有三方面都合乎要求，方能胜敌。孙臆认识到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使有锐气）。临境近敌，务在厉（励）气。战日有期，务在断（决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延展军气）。”（《延气》篇）《孙子兵法·地形篇》云：“视卒如婴儿，故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臆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将德篇》）这里说将帅对士卒平时应爱护、敬重，用时则不吝惜。

军气问题向来为古兵家所重视。《司马法·严位》篇云：“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吴子兵法·论将》

篇云：“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尉繚子·战威》篇云：“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斗。”同书《十二陵》篇云：“战在于治气。”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述了韩信与刘邦论兵，是古代军旅说的具体运用。刘邦常从容与信谈论诸将的能力，认为各有差异。上问曰：“如我，能将（统帅）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西汉末年的隐士借用黄石公的名义编纂而成的《黄石公三略》，在军旅问题上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使用，坚持将、士并用：“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上略》）本书也同古兵家一样，主张恩威并用，赏罚必信：“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下略》）书中还论述了国君与主将应有的品德及相互关系：“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中略》）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一生征战，在治军中特别注意任将选士。《诸葛亮集》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

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又说：“贵人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渝。”诸葛亮对为将者提出了忠告，诫其避免八弊：“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他对将和兵有辩证的认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曹操《孙子兵法注》在诠释中推衍了孙武奖赏士卒的见解，认为这是“欲使将恩下及也”，“所以率进上士也”。（《作战篇》注）曹公说：“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谋攻篇》注）他认为治军不同于治国。用兵国之政来治军，士卒则生疑惑。宋襄公以礼治兵而失败的教训，曹公是深有所知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教练士卒颇多论述。李靖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卷上》）李靖教兵得法，并附之以图。当唐太宗问：“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今教以何道为要？”李靖回答说：“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到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

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卷中》）李靖运用严密的编制进行训练。

李筌重视激励士气，调动兵卒的积极性。“《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太白阴经·人谋下·励士篇》）

于谦发展了军旅说的励士之义，并做了具体说明：“今朝廷用兵，未尝无激励之法，有功者升，误事者罚，阵亡者录其子孙，饥寒者给予衣食。但恐各该官军头目中间，亦有不能仰体朝廷，讲武励士之心，因循月日，保位偷安，甚者假公营私，役使掎克。”（《少保于公奏议·曹习古进策言》）

《练兵实纪》（戚继光著）主要讲述治军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对战士的关怀，专设《爱士卒》一篇，开篇说：“将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将诚勇以力相敌，不过数人极矣。数十万之众，非一人可当；必赖士卒誓同生死，奋勇当锋……如今将领不惟不如此推恩，而且使之肩舆，使之供爨，使之厮役，死亡不恤，冻馁不问，甚至敛科财物，克成月粮。”戚继光针对明朝军中的弊病，提出爱士卒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曾国藩对将官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勤。他说：

“营官之要，全在一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察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肢体勤则风寒难入，筋骨日强矣。办大事者在内贵有志气，在外贵得人心。”（《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二）

军旅是战争的主体，由各级军官和广大的士兵组成，在作战中最活跃的因素，其潜在的利与害也是无比巨大的。今之治军者，要善于从古兵家的论述和战例中汲取精华，为我所用；至于剔除其糟粕，自不待言。